

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国英语研究

李新征

(兰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 根据自建小型语料库, 运用认知语言学中隐喻、转喻等理论及相关社会语言学理论, 分析中国英语的使用频率和搭配情况, 探究其产生原因及其背后的认知机制。结果表明, 中国英语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方式: 新造和演变; 中国的社会背景、隐喻、转喻等对中国英语的出现影响巨大。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中国英语的研究既是对中国英语研究的推进, 也是对世界英语变体研究的完善。

关键词: 中国英语; 认知社会语言学; 世界英语变体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9499(2017)02-0191-02

一、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1. 理论基础

认知社会语言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 2007年, 在波兰克拉科(Kraków)召开的第十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上正式被确立为认知社会语言学分支^[1]。王天翼、王寅将认知社会语言学定位为: 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 以“语言意义”为中心, 以“实际用法”为取向, 从语言的社会性和认知角度深入研究语言变异、社会方言、文化模型、意识形态、双语对比、语言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语言的社会性表现在语言与历史、社会和文化知识的紧密关系, 研究语言意义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借助成分或特征分析进行符号意义研究, 或是通过句法规则构建句子语义, 而是阐明理解一个词语、句子所需要的前提知识。这一知识不以个人为导向, 具有集体性质和一定的传统性; 语言的认知角度在于语言的创造和变异必然有人的认知原因。

在人类认知过程中, 作为人类重要认知方式的隐喻和转喻在此过程中必然发挥重要作用。人们通常会参照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来认识陌生的、无形的、抽象的概念, 从而形成不同概念间的相互关联。概念隐喻就是概念系统中的跨域映射, 是以一个概念来理解另一个概念域的经验^[2]。和隐喻不同的是, 转喻是一种域内映射。强调同一认知域内事物之间的相邻性^[3]。因此, 认知社会语言学就是要借助认知语言学中的转喻、隐喻、认知域等研究成果以及相关的社会语言学理论来研究语言的使用情况。

2. 研究方法

为了调查中国英语在中国的具体使用情况, 本文收集2001—2015年15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自建小型语料库, 对中国英语的使用频率和相关搭配进行统计和分析, 并且为了说明中国英语与标准英语的不同, 收集相同年份的美国国情咨文建成语料库形成对比。然后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出发, 从社会因素和认知因素两方面分析中国英语形成的社

会和认知动因。自建语料库共计262 761字, 包括中国政府报告和美国国情咨文两个子库, 中国政府报告共计179 813字, 美国国情咨文82 948字。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紧跟我国的具体国情, 是中国英语产生的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对中国英语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同时, 使用美国国情咨文语料库作为对比, 发现中西方英语使用的不同。主要使用的语料库软件为AntConc 3.4.4。该软件由Laurence Anthony设计, 是一款免费多平台软件, 用于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and 数据驱动学习, 主要功能包括功能词搜索、词库和关键词的提取等。

二、中国英语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

李文中认为, 中国英语是以“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等手段进入英语交际的。可以看出, 中国英语的产生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新造, 这种方式主要用于描述独具中国特色、在英语中没有合适对应项的情况。二是演变, 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因为英语的一些用法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发生了变化, 包括意义、搭配或情感色彩的改变。但无论是何种形式, 都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认知模式密不可分。

1. 新造

在弥补中西文化差异、描述中国特有文化方面, 新造词、短语或搭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也丰富了世界英语变体。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新造中国英语不断地进入英语并且在中国的外交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 人们所处的社会背景, 包括获得的知识、文化风俗和宗教信仰等无不促进了有别于标准英语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英语的出现, 其中, 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随着每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发表, 新的词汇、短语或结构也随之出现, 在政府权威的作用下, 得到广泛使用。如政治语域中, “Three Represents”(三个代表), “three direct links”(三通), “Eight Honors and Eight Disgraces”(八荣八耻),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四项基

收稿日期: 2017-01-11

作者简介: 李新征(1978—), 女, 河南周口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翻译、英语教学研究。

本原则),“Three Rurals Issues”(三农问题)等。经济领域“two-track price system”(双轨制价格)和“triangle debt”(三角债)等。这些词语首先体现了中国的国情,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其次,符合中国的文化认知模式之一,带有中国词语的一大特征——数字。

在对外宣传和交际中,汉语句式经常采用缩略形式,以达到简明扼要的目的,而这种文化认知模式反映在中国英语中,有多种表达形式,最常见的便是使用数字。其认知动因则多是通过隐喻、转喻等认知方式实现的。新造语言在表义明确的基础上要做到简单、生动,才能很快地被人们理解和使用。作为人类重要的认知方式,隐喻、转喻等的使用使复杂的事物简单化。新的词语、结构的创造,往往借助于日常生活中熟悉常见的事物或事物最突出的特点,通过隐喻或转喻映射到新的语言表达中^[4]。

2.演变

中国英语不仅包括英语里本身没有的词汇和用法,也包括那些在中国的使用环境下语义、搭配或使用产生变化的情况。以“priority”一词为例,通过调查其在政府报告和国情咨文中的出现频率和搭配情况,发现“priority”在两者中的使用情况如下:

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和美国国情咨文在“priority”一词的使用频率和搭配上存在巨大不同。从出现频率上来说,“priority”在中国政府报告中共出现132次,平均1 362.22个字出现一次,另外,“priority”出现在“... be/ is/ was/ were...”结构中的频率为6次,占总出现次数的4.55%;出现在“make...a priority”结构中的频率为12,占总次数的9.10%;出现在“give... Priority”结构中92次,占69.70%;其他情况22次,占16.67%。而在国情咨文中,“priority”一共出现13次,6 380.62个词出现一次。其出现在“...be/ is/ was/ were...”结构中的频率为10次,占总出现次数的76.92%;“make...a priority”结构中的频率为2次,占总次数

的15.38%。“Give...priority”结构0次。其他1次,占7.7%。通过对比可以发现,“priority”一词在中国政府报告中出现的密度要大于在美国国情咨文中的密度,前者是后者的4.68倍。

此外,中美对于同一意义的表达却选取不同的结构则与各自不同的文化认知有关。认知语言学中认知凸显的理论认为,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于同一认知域中的凸显有所不同,这就是中国人更倾向于使用“...give... priority...”,而美国人使用“...be/ is/ are/ was/ were...”的认知动因。众所周知,英语是静态语言,而汉语是动态语言,因此,对于西方人来说,“priority”一词最凸显的搭配是静态的“...be/ is/ are/ was/ were...”,而对中国人来说,最凸显的则是“give...priority...”的结构。虽然两者的认知属于同一认知域,但相对凸显的部分却截然不同。

三、结语

在中国综合国力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英语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英语。本文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视角下,以中国英语的实际使用为出发点,探讨了中国英语具体的使用情况,揭示了其形成的社会因素和认知因素,既是对中国英语研究的推进,也是对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研究的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 [1]Bolton,K. Chinese English: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 [2]葛传棣.漫谈由汉译英问题[J].翻译通讯,1980(2).
- [3]孙骥.英语国别变体的研究和英语在中国[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89(2).
- [4]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1(1).

China English in the View of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Li Xinz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an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elf-built mini-corpu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requency and collocation of China English and explores its causes and cognitive mechanism y using the theory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 well as social linguistics theory. Results show that two main ways of new creation and evolution can explain the generation and emergence of China English which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China's social backgroun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nd so so. The study of China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ocial linguistics can not only impel the relevant studies but also i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search on world English variant.

Key words: China English; cognitive social linguistics; world English variant

[责任编辑:万红]